

# 《大众电影》梦碎 老刊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郑洁/文 代小杰/制图

近日,老牌电影杂志《大众电影》资深摄影师、编辑周雁鸣在其微博里发布了杂志面临“四无”家底的惨淡现状,紧接着刘晓庆等名人转发引申微博内容称《大众电影》已经面临停刊,引起中国影协领导和杂志社领导紧急辟谣:《大众电影》没有停刊,运转良好。

一方抛出话题时痛陈其弊,一方解释疑问时选择言简意赅,但无论如何,曾经在那个媒介匮乏年代创造出960万册发行量、能上封面成为众多艺人莫大荣幸的《大众电影》走到了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选择谢幕或找准契机重回读者视线,是摆在《大众电影》面前的两条路。而这场人事和经营危机,在即将到来的期刊媒体业转制时期,无疑成为一个可以认真讨论的案例。

## 事件

## 《大众电影》停刊传闻不断

周雁鸣日前在微博里爆料:“目前杂志社没有社长(外部人兼任),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只有一个临时工),没有广告部(广告都是免费刊登)。”一石激起千层浪,跟《大众电影》有渊源的明星、名人纷纷转帖关注并表示愿意入资这个老品牌,对《大众电影》有感情的读者也持续关注着此事的进展。

记者连线《大众电影》杂志社时,一位编辑称,“四无”情况不存在,也没有停刊,该社社长胡子光都已经对媒体表述了。上述编辑表示,目前杂志有3万多份发行量,就整个电影期刊的情况看也不是极糟,目前主要依靠邮局订阅方式发行,至于二级市场的零售、广告收入等他不方便谈及,但目前数字出版、网站付费下载等方式社里均未涉足。对于《大众电影》是否会因为这场风波酝酿着市场大盘活的计划,该人士表示,目前报刊媒体业的转制即将要展开,等国家部委相关政策下达以后,社里会根据政策指示研究确定经营计划。

记者连线《大众电影》主管部门中国电影家协会(以下简称“影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康健民时,他言简意赅地表示:“它现在运作得很好,有20多个工作人员,各机构岗位齐全。”而对一些媒体报道所说“影协将开紧急会议研讨《大众电影》救急方案”一事,康健民说协会根本没打算开会。

事实上,在2009年《大众电影》就传出破产事件,当时向新浪等媒体透露消息的正是《大众电影》编辑周雁鸣。

收到记者在微博的短信后,周雁鸣和记者取得了联系。他表示,对自己所说的情况,如果不符合他愿意负法律责任,也接受记

者录音,甚至愿意与影协和杂志社领导接受媒体的联合访问。谈及两次爆料,周雁鸣表示,2009年12月,当时《大众电影》副社长翟建农在内部会议上表示,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大众电影》出现财务漏洞,致使破产,此事当时他在场,很多人可以见证,甚至当时都有录音和笔录。而这次再写《大众电影》现状,是很无意地在微博客里写了一些现状,但此事经一些名人转述之后就变成了停刊。“就经济学上说,破产和停刊是完全两个概念。破产的出路就是等着资产重组盘活,事实上影协也的确对刊物进行注资了。”周雁鸣表示,但是停刊的话,作为一个业界的标志性刊物,责任就会有人追究,所以一定会注资勉强先维持。

至于杂志经营现状,周雁鸣称“四无”符合事实,社长胡子光本身是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光解决自己出版社那边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很少到杂志社来。至于社里对外称的“发行3万册”,周雁鸣笑称,他现在天天都在出版社出勤,了解第一手的情况,目前由于发行量太少,邮局已经不收《大众电影》了,现在能靠的订阅路线就是大学图书馆等。没有发行部、没有任何经营手段就是现状,内容老旧不堪,大片《让子弹飞》都公映一周了才做介绍,一个领导兼着70%-80%的版面编辑。至于目前报摊上还能买到《大众电影》,周雁鸣认为也可能是社里的紧急发行。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学会会员、编剧程青松表示,目前《大众电影》的状况确实比较惨,即使有一定的订阅基数,这些机构消费也属于惯性消费,已经不能代表市场的选择了。

《大众电影》目前究竟有多少发行量?周雁鸣表示,可以去检索相关媒体报道。

2010年初《大众电影》宣布破产事件以来,曾有记者很执着地进行了实地访问并得出结论,发行量只有5000册。此前有报道称,颇费了一番周折,记者终于在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买到了2010年最新一期的《大众电影》杂志。而走访多家邮局、报亭却根本买不到新年第一期《大众电影》。随后,上述记者联系上该发行公司得知,因时代而生的《大众电影》如今早已没了昔日辉煌,“每月月发行量不过5000本左右”。

在今年事件发生之后,虽然杂志社相关领导就此进行了辟谣,但仍有众多媒体再探该杂志社,最大的感受就是冷清,记者室、发行部都大门紧闭。目前北京大部分报刊亭和邮局仍然无法买到这本杂志。

记者日前在和平时地区某零售报摊买到了最新一期的《大众电影》。在翻阅中了解到,目前该杂志是半月刊,每期64页左右,分为“影谈”、“封面故事”、“影片”、“电视剧场”、“影人”、“影史”、“资讯”7个栏目,定价6.9元,定价在目前此类杂志中属中等偏低。而内容编排过于保守难以留住青年受众,且文章不再像以前那样禁得起细细阅读、硬伤也不少。“很久不看《大众电影》,最近听说它运行上出现一些问题,就到报摊买了一本看。报摊摊主说现在这份杂志他们只进一到两本,因为怕不好卖。翻开杂志,感觉内容不够活泼、服务性的东西有一些但太不显眼,还有大量约稿质量也一般般,印刷也不精美,很难和现在整本铜版纸的厚版杂志媲美。”对此,一位读者对记者表示。

## 困局

作为一个杂志社的在职员工,周雁鸣为何要两次透露该社危机信息?相信这也是所有读者心中的疑问。对此周雁鸣明确表示,他和另外一些编辑员工对杂志社部分领导很不满,从总体上看,《大众电影》确实是在去年年过七旬的原社长蔡师勇背负“私分国有资产罪”琅铛入狱之后出现了大拐点。而据周雁鸣的表述,他和另外一拨对蔡师勇心怀同情和对杂志社某篇重要报道持反对意见的人,在杂志社里坐起了冷板凳。

周雁鸣表示,目前他没被正式停职,但被冷处理,只有工资,没有发稿机会,平时他也坐班,但是没有电脑和工作设施,另外有副主编等人工资和保险金也被扣。其他员工的福利也比一般单位要差,去年国庆、中秋两个大节没有任何福利。

据国内某权威媒体发布的《蔡师勇的罪与惑》一文表述,当《大众电影》社宣

## 出路

周雁鸣认为,虽然《大众电影》的严重滑坡有人事原因,但也有期刊业大环境的变化,比如同类型竞争对手的增加、数字媒体的冲击等。但《大众电影》的“不作为”仍然是主因。他说道,曾做过《大众电影》副主编的崔博泉在了解到《大众电影》的现状之后痛哭流涕。在崔博泉执掌期间,做了在当时属于开拓性的很多经营尝试,比如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北海后门一个餐厅里搞定期的演员沙龙,以加强媒介和明星界的业务联系;在当时《大众电影》一枝独秀、天天脱销的情况下,他仍督促员工们亲自去卖杂志,为的是沟通市场情况。百花奖是《大众电影》创办的,每年员工们都还要下到工厂、农村去发大奖选票,并征求群众意见,刘晓庆就跟随杂志社做过这样的活动。“在经营上,他(崔博泉)是个野心勃勃、有作为的人。”周雁鸣称。

程青松介绍道,原来中国影协的大

布原社长蔡师勇因为动用国有资产为职工买商业保险,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与会的许多人默默地掉下了眼泪,其中就包括周雁鸣。当时一审判台上的蔡师勇据理力争,否认“私分国有资产罪”,他表示不懂“好事怎么就变成了坏事”。“为职工购买保险是经过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决定的,且已请示了上级财务部门的主管领导,杂志社为职工购买养老保险是为解决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在蔡的辩护律师周泽看来,蔡师勇是无罪的:《大众电影》杂志社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杂志社决策为全体职工购买商业保险是集体决定的,并未违反国家规定,不是违法行为;杂志社用自有资金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做好单位的出版发行工作,且请示了上级财务管理部门,并非以单位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据报道称,《大众电影》杂志社是

## 昔日老牌杂志暴露机制危机

2003年才由中国文联组织统一参加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在1993年集体决策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时,杂志社职工并没有任何基本养老保险。在2003年之前,这本杂志两头够不着,既不参与社保,国家也不核拨资金和员工的工资和退休金。据该媒体报道,当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保专家杨燕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曾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大众电影》杂志社,不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也不能享有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参加合格的企业年金计划也无资格,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却跌入了陷阱;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可谓中国公共组织的福利漏洞。事业单位(特别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产权不清、定性模糊和财务混乱的局面,能让坏人钻空子,也能让好人掉进陷阱。”该案定案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情法冲突”的讨论。

知情人士反映,在蔡师勇事件之后确实给杂志社带来了很大冲击,人员被大量更换。而《大众电影》作为国内在业界声望曾经最强的一份专业期刊,旗下拥有如周雁鸣等一批成名已久的摄影师,这些摄影师对其一些作品保有版权,如今造成《大众电影》在日常营销推广上遇到版权的纠纷。周雁鸣本人也曾因《大众电影》杂志2009年第17期使用了他于2001年5月在上海为演员刘子枫拍摄的一组照片,他称,此次摄影并非杂志社委派,拍摄费用均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创作。《大众电影》杂志社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且未署名,也未支付报酬,侵犯了其发表权、署名权、复制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如何梳理人事关系,调动员工积极性,解决埋在国企改革中的人事“地雷”,或许为未来的媒体业大改制提前敲响了警钟。

## 圈内热议:走向市场才是正道

前也在书店上架,有了1万册的发行量。作为他的纯个人爱好,他邀约圈内手写不拿红包的专业影评,写电影人物对话,并以部分未公映纪录片、剧情片的介绍为主,平均一年出两三本,出版社的版费就用于支付作者稿费。“我们没想商业化操作,但是说明找好定位、做好角度的期刊还是会有消费群。”

“以郭敬明、安妮宝贝主编的期刊的受欢迎程度,说明走向市场才是正道。”在程青松看来,媒体环境、时代消费需求在不断变化,某些老化、僵化的期刊要走向市场难度很大。

“《大众电影》要关门了!要停刊了!经营不下去了!”日前,刘晓庆在微博上的一番惊呼,引来众多网友的“围观”。刘晓庆跟《大众电影》感情深厚,过去几十年中,她曾9次担当杂志“封面女郎”。

“经典版贾宝玉”欧阳奋强惋惜地感慨道:“《大众电影》曾经是中国几代影迷的必读杂志,最后这样,惟有长叹。”

导演高群书则表示,愿接手并注资《大众电影》,以实际行动挽救这本杂志。高群书直言,《大众电影》想要走出困境应该做到潮流与权威兼顾:“这本杂志现在最缺的是一种姿态和观点,包括对电影业的审视,风格变化的同时还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查。”

部分业内人士分析,《大众电影》的品牌还在,但目前杂志不可能去复制《看电影》的成功模式,只有体现出自身历史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特色,找准读者定位,才能重新占领市场。而且与《看电影》这类杂志相比,《大众电影》背靠影协,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应该充分发挥。另外,《大众电影》还需要有力的宣传和包装,推出电子版、与新媒体合作或许是个好办法。

部分网友建议,《大众电影》创刊历史悠久,在对中国电影发展脉络的把握上独一无二,不如主打怀旧风格,也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 《大众电影》大事记

1950年6月16日

《大众电影》在上海发行,由著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筹资,梅朵、王世禄主编。杂志为大32开本,刊名是池宁题写的四个美术字。

1952年1月

《大众电影》与《新电影》合并,改为16开本,办公地点迁址至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1962年

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大众电影》创办了世界上惟一全部依据读者和观众投票评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影评奖,当时被公认是中国电影最公正最权威的奖项。首届百花奖颁奖典礼于1962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所有获奖的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并以这些文艺界领导们的墨宝作为奖品。

1966年6月

《大众电影》出完第六期(总第306期)后,宣布停刊。

1979年1月20日

《大众电影》复刊,主编为林杉,副主编为唐家仁、崔博泉。

1979年5月

《大众电影》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读者间世杰愤怒地给编辑部写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1979年9-11月

《大众电影》在杂志上连续开辟“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专栏,成为当时社会的讨论热点。

1980年5月23日

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这次颁奖,与上一届相隔了17年。

1981年

《大众电影》的发行量由复刊时的50万册逐渐上升到960万册,来访的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数字目瞪口呆地说:“全世界第一。”

20世纪90年代

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崛起,中国电影业走入低谷,《大众电影》也逐步落入历史最低潮期,但依然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期刊之一,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社会科学类重点期刊。

2011年

《大众电影》发行量由巅峰时期几乎“人手一册”的960万册,下滑到对外宣称的3万册。